

该书由西南师范大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中国教育史研究①
中国西南古代教育史

吴洪成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渝佳

封面设计:张 凯

中国教育史研究(上、中、下)

吴洪成 著

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 北碚)

重庆电力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31 总字数:850 千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621-2038-2/G · 1242

定价:49.50 元

□□序

《中国教育史研究》由三部独立著作构成,即《中国教会教育史》、《中国学校教材史》、《中国西南古代教育史》。吴洪成教授撰写这几本著作,主要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教育史学界对这几项课题的研究还比较薄弱,而从教育史学术的发展来看又迫切需要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二是他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中,已经接触到这几个领域并且积累了一定资料。如果说第一方面是编撰这几部书的必要性,那么第二方面则是完成这几部著作的可能性。

《中国学校教材史》探讨了中国古代学校创立起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岁月中,学校教材历史演变的基本过程、阶段特点,在理清纷繁复杂的学校教材历史基本线索的前提下,注重了学校教材自身所涵盖的文化、教育、教学、民族、伦理等问题的研究,既有宏观的历史审视,又有典型教材教学论、教学方法的具体剖析。书中熔历史风云、学术与思想的嬗动、学校教育栩栩如生的画面于一炉,而突出地阐述了教育材料即教材在学校教育发展中的地位及其扮演的重要角色,深入地分析了汉唐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明清心学、汉学及朴学,近代的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马克思主义的输入及其主流地位确立后,对各个历史发展阶段教材的影响。并且,又透过教材明晰地显现出我国学术思想的演进历程。所以,《中国学校教材史》一书,无论从史料价值或学术意义上来看,都是一部难得的著作。

《中国教会教育史》一书是从教育与教学的视角,透视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西方传教士在华的活动及其与中国教育错综复杂的关系,着重论述了教会教

育的兴起及其发展过程,剖析了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西方传教士的角色并非单一,往往身兼数职,在华的活动因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特殊的原因而影响于社会的许多领域,但对教育教学领域的影响最大。教会经过反复地探索、尝试及方略的调整,确立了以兴学设教为手段达到宗教目的和其它目的的指导方针。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逐渐形成了包括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在内的教会学校教育体系,与处于动摇、衰微状态的我国传统教育,与新兴的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特点及思想意识的“新学校”、“新教育”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出现错综复杂的抗争状态。教会教育的历史及命运不仅与中国近代新教育的起步、发展及变革联系紧密,而且在近代政治、社会、文化的变迁、转型、改革的历程中有自己的重要地位。如何客观地评价近现代中国教会教育的目的、地位、功能及影响等问题,不仅是教育史,而且是历史学本身的重大课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会教育已成为历史学者们关注的问题之一,但系统地撰述中国教会教育史的学术专著并不多。吴洪成教授费了很大的心力,撰成此书,是他在教育史研究领域的又一项值得称赞的贡献。

《中国西南古代教育史》是一部断代的区域教育史。20世纪90年代,我国历史学界注重地方史、地区史或区域史的研究,大有方兴未艾之势。中国有修志的历史传统,地方史志资料浩如烟海。“盛世修志”,全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各地史志研究者纷纷撰写各种方志。在史志资料中包括大量教育史料。于是地方教育志、地方教育史的研究也提上日程,引起教育史学者的广泛关注。

中国历史发展极不平衡,地域性、区域性的差异十分明显,全国性的普遍性内容或材料无法代替各地的个性或“乡土性”,而地域文化、乡土文学等则在史学、文学研究中比比皆是。正是这种地区间的差异及特色,才使中国的文化、历史、教育在时间及空间的流动或分布中显示出丰富多彩、色彩斑斓的画卷。中国的大西南是一个独特的历史文化区域,不仅山川地貌、物产、风土人情等方面独占风骚,而且在历史、文化、思想、伦理、价值观等方面也有自己的传统及独特之处。神奇而瑰丽的西南地区曾有光辉灿烂的历史,更有美好而富有生机活力的当今与未来。吴洪成博士出生及求学在水光潋滟、波光粼粼

的江南,而完成学业后却东成西就,在西南重镇重庆任教,一种地区的归属心理、使命感驱使他从事这一问题的研究探讨。《中国西南古代教育史》注重西南历史、文化的嬗动,在宏观的历史背景下,以大量笔墨叙述西南地区各个历史时期的学术教育发生、发展的基本历程,既有教育制度的演变,也有教育理论的阐发,还对地方官学、书院、私学、选举等的纷呈变幻,区域教育内部的比较,民族教育的艰难拓展,西南哲人、学者教育问题的睿智与业绩等等都进行了论述,故本书内容丰富,史料充实,清晰地展示了西南古代教育的面貌。

研究西南古代教育是一个难度很大的课题,我生在西南,长在西南,又在西南师范大学从事教育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但却没有勇气研究西南地区教育史。吴洪成教授则是知难而进,经过他的艰苦努力,终于撰成了《中国西南古代教育史》,填补了区域教育史研究的一项空白。应当学习他刻苦钻研、夙夜匪懈的精神,应当为他的这一成果喝彩。

以上三部书都很注重史料的挖掘,并充分吸收学术界的广泛而细微的研究成果。作者在撰述中力求在历史学与教育学中寻找结合点,体现出教育专史的特色。即一方面有历史的演进,政治、经济、文化的宽广背景,另一方面在阐述教育自身的历史中,注重教育学、教学论理论及方法的运用。吴洪成教授撰写的《中国教会教育史》、《中国学校教材史》、《中国西南古代教育史》三部著作,是对专题教育史和区域教育史研究的贡献,他的这些研究成果,必将对教育史研究领域的拓宽和研究思维方法上的进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当然,由于这几个课题研究的难度大,加之吴洪成教授的教学工作繁忙,这几本书还存在着一些不如人意之处,西南古代教育史还有待于进一步拓宽和充实,这是需要在今后的不断思考及积累中弥补、提高的。更期望有更多的学者们从事于教育专题史和区域教育史的研究,开辟中国教育史研究的新领域,开创教育史研究的新局面。

熊明安

于1998年国庆节

□□前言

《中国教育史研究》由三部独立的书构成,它们是:《中国教会教育史》、《中国学校教材史》、《中国西南古代教育史》。

中国教育史的研究数年来获得了长足的进展,研究领域的扩大、水平的提高、研究视角及方法的转换,无不表示着研究工作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无论是历史学界,还是教育学界都已充分认识到教育史研究对于学术、社会所发挥的价值或功能。当今的时代呼唤着教育史研究的深入进行,以为教育改革与实验、教育理论与实践,提供历史的材料、借鉴或启示。《中国教育史研究》正是出于这样一种时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研究撰述的。

对《中国教育史研究》有关专题材料的搜集始于数年之前,但申报选题到完稿则为时不长。在相对短暂的时光中,我又承担着几门课程的教学任务,兼之学术水平又有待提高。因此,书稿在匆促中遗留的问题或存在的不足,有待于在听取学界同仁的批评以后进行补救。

教育史的学科归属问题向有争议。我是主张进行交叉研究的,既体现出教育教学理论的问题,也反映历史的阶段背景及特点;在研究中突出教育专门领域,但是应从历史宏观的视野进行透视,吸收史学各领域研究的新成果,特别是思想文化史、学术史等内容。

我在杭州大学从大学本科直到博士研究生阶段学的专业是教育学和教育史,但自己对历史学甚有兴趣,同时又涉猎了文学、哲学、美学、经济学等学科领域。研究生阶段的导师陈学恂教授是知名的教育史学家,他治教育史的特色,也是注重史料的搜求及考

订, 史学研究成果的借鉴与吸收, 同时充分反映教育专史的学科特色, 尤其是理论特色。毕业以后, 远离了江南水乡名城杭州, 阔别了故土, 来到山城重庆, 任教于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系、历史系, 又深受此地教育史专家培养研究生课程体系及风格倾向的影响, 即突出教育学原理、心理学、教学论等素养的提高与训练, 偏向教育理论分析。这次撰写的几本小书, 是试图既有教育教学理论的阐释, 又有历史学的宏观或微观的视角, 结合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及基本特点, 并渗透哲学、文学等领域的有关思想内容, 进行综合性的探讨。由于时间上过于仓促, 水平又有限, 与设想的目标肯定距离遥远。古语云: “学不可以已”, 又称“学无止境”, 我愿在以后不断的学习与提高中继续探讨, 以弥补不足, 并修改欠妥之处。屈原在《离骚》中称: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对中国教育史的研究及探索, 前辈及时贤已作了很多工作, 取得一定的成果, 但仍留下许多空白地带与薄弱环节。我们要在此基础上, 沿着这条漫长而不平坦的研究道路继续前进, 去攻克那些未被我们认识的领域的问题。

西南师范大学校、系及出版社领导给予了很大的帮助。《中国教育史研究》的出版得到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基金的资助, 这是来之不易的。我校校长邱玉辉教授, 教科院院长李承武教授, 历史系主任蓝勇教授, 出版社社长宋乃庆教授都给予了无私的、巨大的支持, 使我有力量、有机会在教学工作及其它研究课题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下, 挤出时间, 从事撰述劳动。他们的鼓励和关怀, 使我难以用任何语言表达心中的感激之情。这也是我终身难以忘怀的。惟愿这几本书能对历史学、教育学研究有所裨益, 对教育及文史工作者有参考价值。从更广阔而深远的意义上说, 这项研究倘能有助于改革开放形势下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并能为教育乃至社会的改革与实验提供借鉴材料或有益启示, 那么, 我也可以无愧于他们的关照、勉励及期待了。

吴洪成

1997年12月14日于西南师范大学文化村29号

○目录

序	(1)
前言	(1)
一、引论 地区史与地区教育史.....	(1)
第一章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南教育	(14)
第一节 四川教育	(14)
一、地域与文化.....	(15)
二、四川学校教育创设于何时.....	(23)
三、文翁兴学.....	(26)
四、官学和私学.....	(32)
五、文化教育思想.....	(37)
第二节 云南教育	(45)
一、历史与文化.....	(45)
二、教育活动.....	(46)
第三节 贵州教育	(54)
一、历史与文化.....	(54)
二、教育活动.....	(56)

第二章 隋唐时期的西南教育	(61)
第一节 四川教育	(62)
一、地方官学和私学	(62)
二、前蜀、后蜀的文化教育	(64)
三、教育人物	(66)
第二节 云南教育	(68)
一、历史与文化	(68)
二、教育活动	(71)
第三节 贵州教育	(74)
第三章 宋元时期的西南教育	(77)
第一节 四川教育	(78)
一、地方官学	(81)
二、书院	(82)
三、私学	(86)
四、科举考试	(95)
五、教育家及教育人物	(96)
第二节 云南教育	(112)
一、学校教育	(112)
二、民族教育	(115)
三、宗教教育	(117)
第三节 贵州教育	(118)
第四章 明清(鸦片战争以前)的西南教育(上)	
——四川教育	(123)
第一节 明清(鸦片战争以前)的西南教育鸟瞰	(123)
第二节 历史与文化	(132)
一、历史概述	(132)

二、文化特色	(134)
第三节 地方官学	(135)
一、明代地方官学	(135)
二、清代地方官学	(137)
第四节 书院	(141)
一、书院概述	(141)
二、重要书院举要	(145)
第五节 民族教育	(150)
一、凉山彝族教育	(150)
二、苗族教育	(151)
第六节 私学、义学	(152)
一、私学	(152)
二、义学	(155)
第七节 科举制度	(158)
一、科举制度的类型	(158)
二、试院(考场设置)——以长寿县为例	(159)
三、考试内容、方法、条规及考录名额——以长寿县为例	(160)
第八节 教育家及教育人物	(161)
一、彭端淑的教育思想	(161)
二、其他教育人物	(165)
第五章 明清(鸦片战争以前)的西南教育(中)	
—— 云南教育	(179)
第一节 历史与文化	(179)
一、历史发展	(179)
二、文化概况	(180)
第二节 地方官学	(182)
一、地方官学的发展	(182)
二、民族地区的地方官学	(184)

三、云南士子入国子监	(186)
第三节 书院	(187)
一、书院概述	(187)
二、重要书院简介	(189)
第四节 社学、义学、卫学、私塾	(191)
一、社学	(191)
二、义学	(192)
三、卫学	(194)
四、私塾	(194)
第六节 教育发展的特点	(196)
一、学术教育,养成忠君的观念	(196)
二、学校教育与科举紧密结合	(197)
三、儒学的传播,地方文化的发展	(199)
四、民族文化深入内地	(200)
五、彝族自治区学校教育的拓展	(201)
第六章 明清(鸦片战争以前)的西南教育(下)	
—— 贵州教育	(205)
第一节 历史与文化	(205)
一、历史概述	(205)
二、文化特色	(206)
第二节 地方官学与科举制度	(210)
一、明代地方官学	(211)
二、清代前期的地方官学	(218)
三、科举考试	(221)
第三节 书院	(223)
一、书院概述	(223)
二、重要书院举要	(228)
第四节 社学、义学、私塾及其宗教教育	(231)
一、社学	(231)

二、义学	(231)
三、私塾	(233)
四、宗教教育	(233)
第五节 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	(237)
一、王守仁与贵州教育	(237)
二、孙应鳌的教育思想	(241)
三、莫与俦的教育思想	(245)
四、郑珍的教育思想	(246)
五、女诗人郑淑昭的家庭教育观	(249)
第七章 结语——中国西南古代教育史断想	(257)
第一节 西南古代教育发展的一些特点	(257)
一、历史悠久,成就显著	(257)
二、发展的不平衡性	(261)
三、明清时期西南地区的教育走出封闭,与外界的交流 加强	(268)
四、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始终受到重视	(282)
第二节 西南古代教育发展的一些基本线索	(285)
一、西南地区古代文化教育的历史演进深受汉族文化 教育的影响与渗透	(285)
二、西南地区古代教育受政治及经济发展的制约	(291)
三、西南古代区域教育发展的整体性	(295)
四、西南古代文化与近代文化教育的继承性与沿续 性	(297)
五、人口迁移与西南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	(299)
后记	(303)

○引论

地区史与地区教育史

(一) 有关地区史的问题

地区首先是一个地区概念。一般我们所谓的地区是指在地理条件下相同或相近的一个区域单位。中国幅员辽阔，相邻的几个省区由于大致相同的气候、植被、物产、民族分布以及交通状况等地区条件，自然地形成了包括数个省区在内的联系密切而又相对独立于其他区域的地区，比如西南地区、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地区的各种自然地理条件，不会因为人类社会历史的推移而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地区还是一个文化概念。在这种相对独立而又区别于其它区域的地区内，除了地理上的因素外，在饮食、服饰、年节、丧葬、婚俗、宗教信仰、房屋建筑等风俗习惯、语言(方言)以及其他文化传统等方面，大致相同或相似。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一定的地区文化特征和风格，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中，呈现出一定的地域特征。

地区又是一个政治历史概念。一个地区的形成有其特定的历史渊源，中国历史上，有着把所辖范围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因素参考其方位划分若干行政区域的传统。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地区的名称及其范围虽然时有变化，但地区概念和内涵却在不断地明确和完善，并逐渐地为人们所接受。

西南地区史,就是研究西南三省(云南、贵州、四川)^①地区发生在历史上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关系、文化、教育、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制度、历史事件和在上述各方面产生较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以及该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和特点。

云、贵、川三省位于祖国的西南部,自然地理条件大致相同。除成都平原和川中丘陵区外,境内大部分地区处于高山高原地带,河流湍急,山路崎岖,既不利舟楫水运,亦不便车马往来,交通运输相当部分靠人负畜驮来进行。明、清以前,整个西南地区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

云、贵、川三省又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主要地区,该地区生活着二十多个少数民族,有些民族为该地区所独有。该地区的少数民族在长期的民族交往和历史发展中,创造出他们独特的民族文化。古代的巴蜀、滇、夜郎文化表现出与中原文化不同的民族文化的某些共同特征,在近代,西南地区在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和社会习俗等方面,也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西南地区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的融合发展,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容。

云、贵、川三省自古以来在经济上就有着密切的交往联系。秦朝时,就从今宜宾至昭通一带修筑了“五尺道”,开通了巴蜀至云、贵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线。西汉初年,巴蜀地区与云、贵少数民族地区维持着较为频繁的商品交换关系,巴蜀的铁器和其他商品运入云、贵少数民族地区,换回云、贵少数民族地区的箬马、牦牛和僮(奴隶),蜀地生产的枸酱还经由夜郎牂牁江转贩到南越。近代以来,川盐除了少量供应京城朝廷食用外,主要销售四川和贵州的大部分地区及云南部分地区。川盐对云、贵两省,特别是贵州大部分地区的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发生在三省区内的政治事件和军事行动或是互相影响,或是波及整个地区。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莫不如此。

^① 这里的四川省包括重庆市直辖前的行政区域。

(二) 有关地区教育史的问题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教育分支科学的竞相崛起,地区(区域)教育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区域教育史、教育地理学尤其引人注目,发人深思。要想真正把握世界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揭示教育的本质特征,不仅要考察历史的、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民族的背景,而且还要深入研究不同的地区背景这一重要因素。任何一种民族都是在一定地域供养、熏陶下的民族;任何一种教育都总是在一定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综合影响下的教育。教育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征。各地区地理环境并不一样,这就形成不同地区在教育的历史演变、分布变迁、空间结构等方面的地域差异与特色。

地理环境对教育的影响是明显而深远的。其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对教育活动主体的生理、心理的影响以及对校舍建筑、课程计划安排等的制约上。其间接影响主要是通过直接作用于一定的民族文化传统、生产方式来影响教育的。一定的地理环境特色会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铸就一个民族的心理气质、性格特色和精神风貌,再加上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特色对文化的长期制约和深化,便使一定区域的民族性沉淀下来,形成民族文化传统。如山地的居民由于交通阻塞,与外界交往少,商业气息淡薄,故为人一般比较憨厚、质朴;而沿海、平原的居民,因交通通达,商业气息浓厚,社会交往多,故为人相对灵敏。这种民族性格特征沉淀下来形成民族文化传统,反映在教育特色上呈现平地重文出文才,山地尚武出武才。地理环境并不总是一成不变的,地理环境变迁使经济重心发生迁移,使教育中心随之迁移。同时地理环境变迁也使教育内容相应发生许多变化。如中国历史上教育重心南移的直接原因是经济重心的南移,而深层的原因之一是北方生态环境变差,气候变寒冷,而南方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经过经济开发,形成良好的地理环境。生产力水平越高,人类拥有的利用和驾驭地理环境的能力越强,其征服和改造地理环境的活动越向高级的程度发展,但是,所谓人类

征服地理环境并不意味着人类绝对摆脱了对地理环境的依赖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以不同于过去的形式表现而已。或者说,社会生产力越高,人类所拥有的利用和驾驭地理环境的能力越强,其征服和改造地理环境的活动越向高级的程度发展。人类就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和更深刻的程度上接受地理环境条件的制约,从而使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关系变得日益复杂化了。

区域性是地理学的根本特性。区域是指具有一定内聚力的、具有特色的地区。区域教育是在教育上具有特色的地区,指有一定的地区依托、有一个或几个教育文化中心、具有一定的辐射范围的地域系统。区域教育发展指的是在一定的区域条件制约下,区域教育的物质构成变化和观念的变更。它不仅包括教育规模的变化、教育结构的变迁、教育水平的提高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而且包含着导致上述变迁的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育体制或制度的变动。

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界是人的劳动的对象。人类历史创造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通过和自然界之间的物质交换,或者说,通过对自然物质的调整、控制和改造,以谋求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地理环境不仅为社会的发展提供有利或不利的条件,它自身也在与人类活动的交互作用中不断改变面貌。自有人类以来,地理环境因自然本身的发展而引起的变化总体来说是缓慢的,而在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下引起的变化却随社会的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的加强而不断扩大、加深。因此,作为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一个方面的地理环境主要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正因为如此,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时绝不能忽视地理环境及其作用。

以巴蜀地域为例,对其文化思想略加考述。

从地域文化的角度着眼,可从中得到一些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汉书·地理志》说:

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以为郡。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疏食、果实之饶。南贾滇、犍僮,西近邛、笮马、旄牛。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洗,